

新民印书馆内外的安藤更生与周作人

陈言

论文摘要：1949 年 1 月 5 日，位于阜成门外北礼士路的新民印书馆着火，损失之惨重，时人认为不亚于一所大学被毁。因为沦陷时期新民印书馆垄断了华北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在一代人的人格和审美品位的形成阶段起到了形塑作用；创办的部分刊物所养成的学术品格和审美品位至今都有余响，成为考察民国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的一手资料；出版的著作广涉各个学科。日本战败之后，新民印书馆被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接管，国民党迁台，留下的厂房、设备被共产党接管后，建为新华印刷厂；当初筹建和经营新民印书馆的日方人士遣返之后，创建了东京印书馆。战时的新民印书馆在战后以正中书局、新华印刷厂和东京印书馆几种面貌重现于同时代的东亚台湾、北京和东京。在我们重新探讨东亚史上的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种种纠葛时，新民印书馆无疑是个有意义的个案。在新民印书馆内外，先后担任新民印书馆的编辑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安藤更生与周作人缔结的友谊，充满了历史与时代的况味。回望新民印书馆的内与外，通过系统地梳理安藤与周作人交往的细节，来呈现北京沦陷区殖民现代语境下敌国之间文化人与学知的对立和交融，从而进一步探讨殖民主义的内涵，以及周作人落水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胁迫的等问题。

关键词：新民印书馆 安藤更生 周作人

一、问题的提起

1949年1月5日，位于阜成门外北礼士路的新民印书馆着火，损失惨重。《晨报》、《世界日报》等报纸进行了报道，结果“北平的出版界和文化界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新民印书馆是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华的中坚堡垒，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甚至满洲都没有这样一个印刷工厂，日本投降后归官僚资本正中书局接收，业务不振，不期在解放战争中被伪军付之一炬，十年经营，一旦灰烬，使人感觉破坏之易与建设之难！我们敢说，新民印书馆之破坏，其损失之大，决不在一个大学的破坏之下。”¹

将新民印书馆的存在价值比喻为一所大学，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它垄断了华北沦陷区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在一代人的性格和审美品位的形成阶段起到了形塑作用²；创办刊物十余种，刊物罗致了华北沦陷区的中坚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中和月刊》、《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等杂志所养成的学术品格和审美品位至今都有余响，成为考察民国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的一手资料；出版的著作广涉教科书、法律、制度政策、宗教、地志、民俗、语言学、文学、历史、地图等，发行“东方民俗丛书”、“通俗历史丛书”、“中国留日同学会丛书”、“新进作家集”、“创作连丛”、“少年文库”、“百页丛刊”等多种，为华北民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民印书馆在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方面的优势，使得它早早地就被国民党接管，赶印三民主义及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以供急需。³次年3月，在多家印刷所争抢中，由具有陈（陈立夫、陈果夫）系背景的正中书局接管。⁴也就是说，

1 林文轩：《文化调查：新民印书馆》，《世界与中国》第4卷第2期，1949年。

2 在北京沦陷时期读过小学（1939-1945）的邵燕祥回忆说：“我在沦于敌手的北平古城读到的中学国文课本——就是我哥哥姐姐在课堂上用的教科书，虽然是敌伪教育总署审定，由敌伪控制的新民印书馆出版发行，其实是抗战以前一套教材的盗版。”“我在小学的时候，当然还有别的课外读物，跟这些中学《国文》课本一起，互为补充，形成对我的文学启蒙，培养了我对母语和母语文学的热爱，影响了我一生——我想，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我后来以写作为业。”邵燕祥：《中学〈国文〉琐忆》，王丽主编：《我们怎样学语文》，2002年，第122页，第120页。邵燕祥的这番话，最初从黄汉青的《关于新民印书馆》（『新民印書館について』、『日吉紀要』2009年No.41）一文里读到。

3 “华北教育接收工作 接收机构计三十六处”，《申报》1945年12月28日第4版。

在印刷厂失火之际，它已被接管，“新民印书馆”已然不存在。报刊中反复使用“新民印书馆”，一方面是左翼媒体为了渲染对国民党接收新民印书馆及其后腐败现象的不满：“起火的原因，传说是兵士用汽油刷洗衣服所致，但未必可靠。因为厂中马达数十，俱被盗卖。……据我们推测，甚有盗卖之后防火灭迹的可能。其次即是趁火打劫，也是可能的”⁵；另一方面，时人的叙述让人感受到殖民遗产新民印书馆曾经的辉煌：对开、全张凹版机、照排机，万能铸字机、绘石版、珂罗版、照相分色版、三色铜版等设备从日本购入，是北京最早拥有胶印机的机构，并且常常用一句“连满洲也没有”来证明其设备之先进。毕业于北京沦陷区的中国大学、谙熟北京印刷行业的东方印刷所林文轩撰写的《文化调查：新民印书馆》一文，描述了新民印书馆鼎盛时期的状况：“全部机器开动时，可以用一千五百工人工作，每天可印刷一千令报纸，除了报纸以外，它可以垄断全华北的印刷工业”。文中罗列了活版印刷部、平版印刷部、活版铸字部、纸型及铅版部、制版部、照像部等不同部门所拥有的机器种类数量，以及字模的种类、磅数等；同时详细记载了火灾之后机器的损失情况。最后以痛彻心扉的一番感叹结束：“这样规模宏大的印刷工厂，华北出版业的重心，文化的摇篮，不毁于战火，而被少数自私的匪徒破坏，造成中国文化界的浩劫，每逢想起，怎能不叫人悲哀愤怒！”⁶

这样一所其存在价值堪比大学的出版和印刷机构，“在商业上发生了大资本家垄断的作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大本营”⁷，它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轨迹，又以另外几种面貌出现（正中书局、新华印刷厂、东京印书馆）在同时代的台湾、北京和东京，在我们重新探讨东亚史上的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种种纠葛时，新民印书馆无疑是个有意义的个案。

4 正中书局 1931 年由陈立夫创立，1933 年陈立夫将书局捐献给国民党。1949 年正中书局迁台，留下的厂房、设备被共产党接管后，于同年 4 月建为新华印刷厂。人民出版社成立时使用的纸库，即新民印书馆印刷厂后院的几间破房子。新华印刷厂后来成为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国家级重点书刊印刷企业。当初筹建新民印书馆和在其中工作的日方人士遣返之后，于 1947 年 8 月创建了东京印书馆。

5 林文轩：《文化调查：新民印书馆》，《世界与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49 年。

6 林文轩：《文化调查：新民印书馆》，《世界与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49 年。

7 林文轩：《文化调查：新民印书馆》，《世界与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49 年。

围绕新民印书馆这个国策公司，美术史家安藤更生（1900-1970）从印书馆筹备伊始，到日本战败，一直以它为阵地展开活动，先后担任新民印书馆的编辑部长、代理部长。周作人在北京沦陷时期的所有著作，有一半由新民印书馆出版；周氏宣布重开日本店，选择的是新民印书馆创办的刊物；他担任艺文社的社长，主持《艺文杂志》，艺文社与《艺文杂志》均隶属于新民印书馆；同样隶属于新民印书馆的《文学集刊》，在发行时以周作人的名义对外宣传。安藤担任新民印书馆的外围机构中国文化振兴会理事长，周作人则是中国文化振兴会的名誉顾问。沦陷后期的周作人与寓京台湾人张深切关系破裂、后来演化成周作人对其弟子沈启无宣布“破门声明”，都与新民印书馆的办刊活动有关，其背后都有安藤的影子。撇开新民印书馆这个阵地，安藤1946年返回日本，之后始终称自己是周氏唯一的日本弟子。1963年秋，作为鉴真研究专家的安藤访华，通过层层手续、请托诸多实权人物，才得以实现拜访周作人的愿望，而这次拜访，也成为周氏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海外友人。就各自的写作而言，安藤自从1938年起，就持续地观察和记录中国。周作人则更早地开始书写日本，是公认的知日派。对异国的书写在各自的晚年都凝练成一种情结，化到了最直接的日常生活中：安藤在其去世的前十天支撑着病体，辗转到横滨中华街去买中国的拐杖，后来“买到了期待中的拐棍”，他说“有了旅路上永远的相伴者”。⁸周作人则通过安藤和香港的鲍耀明等人，不断地索取日本的点心。在新民印书馆内外，兼有官方和艺术家身份的安藤与周作人缔结的友谊，充满了历史与时代的况味。回望新民印书馆的内与外，通过系统梳理安藤与周作人交往的细节，来呈现北京沦陷区殖民现代语境下敌国之间文化人与学知的对立和交融。

二、何谓“新民印书馆”？

在中国当代学术语境中，“新民印书馆”被赋予时间性，成为一个殖民史概

8 安藤更生年譜作成委員会編：《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91頁。

念，有限的述说充满成见和谬误。相比之下，日文史料稍显丰富，基础资料如东京印书馆 50 周年社史编纂委员会编《东京印书馆 50 年》（『東京印書館の 50 年』東京印書館 1998）中所收久田隆二的《新民印书馆时代》（『新民印書館時代』）、平凡社教育产业中心编《平凡社六十年史》（平凡社 1974）、下中弥三郎传刊行会编《下中弥三郎事典》（平凡社 1965）等。旅日中国学者黄汉青在上述资料基础上撰写的《关于新民印书馆》一文，在新民印书馆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相关的中文研究成果阙如，笔者在展开研究之前，将黄汉青一文的研究要点归纳如下。

首先，论文讲述了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创办新民印书馆的意图。1935 年 10 月平凡社面临破产，下中决定到海外发展，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之所以选择北京，是下中在军部有深厚的人脉。下中担任 1932 年 4 月创立的泛亚细亚学会的理事会代表，近卫文麿、松井石根、末次信正、广田弘毅等是该学会评议员。以该学会为媒介，下中又得以结识陆海军的军官，承担了军事杂志《陆军画报》的印刷和发行职能。欲立足于北京，必须借助军方力量。而选择以教科书为最重要的经营业务，一是教科书发行量大、获利容易、发行稳定，二是日本自 1914 年就不满中国的排日教科书，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发生的排日行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排日教科书的存在，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删除华北地区中小学教科书的排日内容。

其次，详细梳理了新民印书馆创立始末。下中先是在 1938 年年初访问了奉天的满洲共同印刷株式会社，在筹划报告等方面得到了满洲方面的援助。然后转道天津，会见东亚文化协会的中心人物饭河道雄，就华北地区教科书的印刷、配给公司的设立进行洽谈。并拟定以殷汝耕的后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代理长官池宗墨为未来新民印书馆的首任社长。接着到北京，与日本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接洽，借助北支派遣军特务部总务课长根本博、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特务部秘书松井正藏等人的力量，将位于阜成门外北礼士路上的私立成达中学迁出，以那片区域充当印刷工厂，占地 12000 坪，建筑占地 3000 坪，并建有网球场、棒球场、

排球场、足球场。最后，回到日本，召开共同印刷、凸版印刷、大日本印刷公司的会议，明确新公司的运营权归平凡社，技术、营业、经理权限归上述各公司；明确新民印书馆创立事务所为东京市京桥区1丁目2番地。1938年4月9日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刊载了新民印书馆成立的消息。该消息称：在军部以及新政府的援助下，资本金1000万日圆的日支合办股份有限公司新民印书馆成立。成立的要项有4条：1、承担中华民国政府编纂的教科书的翻刻发行以及日本军部和临时政府官厅刊行物的出版；2、组织依据中华民国令；3、1938年8月工厂设备完成的同时展开业务；4、社长由中方担任，专业职务由日方选配。

新民印书馆1938年5月办完全部手续，6月启动印刷出版教科书事业。8月18日召开创立总会。发行总部设在东单苏州胡同155号⁹。印书馆刚成立时的第一次职员名簿上记载有中方职员“董事长（社长）池宗墨，庶务董事张汉槎（其它四名为政府要人故匿名不载）”¹⁰。日方职员有副社长下中弥三郎、专务董事安永秀雄、常务董事田中庄太郎、井上源之丞等。此外，编辑部长安藤更生、总务部长杉平利一、工务部长和田荣吉。新民印书馆本来拟定中日合办，但是在樱井正藏的斡旋下，由日本军掌管的河北银行筹措出350万资金后，中方资金无法到位，后通过在日本国内招股的形式完成资金筹措。到了1939年8月，由曹汝霖担任第二届新民印书馆董事长（社长）。1940年下中弥三郎辞去副社长返回国内，副社长由高桥守平担任。1942年6月，常务董事陈达民的共产党员身份遭泄密，被宪兵逮捕。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际，董事长、副董事长分别是曹汝霖、高桥守平，其他职员有祝惺元、瞿益锴、宋廉、田中庄太郎、和田荣吉。

再者，描述了新民印书馆的业务及出版业绩。新民印书馆最重要的业务，是印刷、发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编审会编纂的中小学“国定”教科书。华北地区形成稳定的配送和发售系统。新民印书馆发行《新民印书馆报》，每号刊载

9 这里要提一下：苏州胡同155号，此前是饭河道雄于1935年建立的“奉天东方印书馆北平分馆”的地址。新民印书馆在筹建思路、人员、馆址设置等多方面都得到了满洲官方的支持。

10 原始材料见东京印书馆编纂委员会编《东京印书馆の50年》、东京印书馆、1998、P286。

教科书目录。新民印书馆的印刷工厂具有日本最先进的机械，并且开设免费培养印刷工人的技术学校“新民印书馆养工学校”，从1939年10月15日开始招生，培训两年，设置日语科目，支付学员教科书和制服，以及每月9-15元的生活费。毕业学员新民印书馆优先选用，前三年属于义务期。新民印书馆除了教科书，还发行各官厅、各种团体的刊物、书籍，也售卖学生用品、办公用品、运动器具、日用杂货。因背后有强有力的军方支持，自从1938年日本国内开始实施报刊用纸的统制以来，新民印书馆的用纸均由日本输入，且配给渠道一直畅通无阻。¹¹该馆自成立起先是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1940年以后直接受辖于兴亚院。

三、新民印书馆内的安藤更生与周作人

在上述史料和研究中，安藤更生的名字仅仅作为“编辑部长”出现过一次，但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要。无论是创立者下中，还是中方的曹汝霖，概不参与实际的编辑出版事务。下中中途回国，“曹汝霖”之所以被动员、被征用，是他的名字所具有象征意义。安藤更生则是从筹备到创立、到运营始终坚守在业务前线、与北京文坛的中国人打交道的最重要人物。笔者在这里将安藤、周作人、张深切、沈启无等人在北京沦陷区的言动对照阅读，来呈现他们之间的关系。

安藤更生，日本的美术史家，生于东京，1922年4月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法文科。1923年成立奈良美术研究会（后来的东洋美术研究会），1924年因贫困退学，1929年创办杂志《东洋美术》。战后任早稻田大学教授。他从1917年前后开始耽读中国的怪谈笔记小说《剪灯新话》、《夜谭随录》等，并以此为契机，阅读汉文和白话。1931年入平凡社，担任大百科事典审查部职员，这是他与下中弥三郎结识的开始。1935年夏赴“满洲国”和朝鲜旅行。1937年11月介入新民印书馆的筹备工作。安藤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新民印书馆创立的初衷，也揭示了它与军部的关系：

11 以上三部分内容，均为对黄汉青的『新民印書館について』（《关于新民印书馆》、『日吉紀要』2009年No. 41。）一文中的提炼总结。

中国战前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个规模巨大的印刷兼出版的大公司，出版了大量好书。然而与日本相处不睦，成为反抗日本的大本营。这不利于日中两国亲善。下中先生认为无论如何，日本都要与中国联手，通过文化事业实现两国国民的深刻理解。于是，下中先生与共同社、大日本和凸版日本这三大公司洽谈，再加上平凡社，由这四大公司出资一半，中国政府方出资一半，合办公司。那是昭和十二年的秋天，那个时候，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都是军部的全盛时期，那是个不了解军队就无法做好任何事情的时代。所以平凡社的某人要是去现地，必须要了解北支派遣军。……

那时，我对零智商的军队因为战争而破坏中国的遗迹和文化遗产的状况很是担忧，屡屡去与陆军省谈判，请求他们派遣我去现地。傲慢的军人根本不予理睬，说，如果想去做，自己去现地好了。所幸有新闻班的松井真二中佐，他让我以从军的形式去现地。于是（1937年）11月月末，我从东京出发去新京，从那里去天津。¹²

1938年1月2日，在北京府右街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安藤与参谋石本菊雄中佐见面，商谈成立新民印书馆之事，得到了后者的极力赞成。之后，安藤从军北支派遣军，到奉天、天津、北京、张家口、大同、云冈、绥远、包头各地巡回。特别是为了保护大同石佛而与军方斡旋，成功地使石佛免于战火。同时忙于中国方面的宣传状况的视察。2月回国，其间为在北京创立国策印刷公司奔波。新民印书馆成立之后，安藤担任编辑课长。12月寓居北京内区北池子骑沙楼的清华同学会。是因为一有空就可以去琉璃厂。与在华特别研究员实藤惠秀每天都去实地考察北京民情。在经历战火之后，琉璃厂关闭的店陆续重新开张。安藤描述了重新开业的琉璃厂店铺的景象：“各个店里熟悉的人也都来了，能够说说话。与

12 安藤更生年譜作成委員会編：《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23頁。

普通的日本人稍有不同，看起来奇怪又很有趣的读书人这样的客人，他们还是很欢迎的。我能够在古书肆的来薰阁、邃雅斋、文友堂等找到很多我要的书。终战时，我的中国书约有两万卷，其中一大半是在琉璃厂的书肆、隆福寺的文奎堂买到的。制作精美的信纸和信封的荣宝斋、清秘阁、松华斋，制作笔的戴月轩、贺莲青，古玩店博古堂、悦古斋、雅文斋、韵古斋，到了夏季就会提供冷的酸梅汤的信远斋，都让我难以忘怀。”¹³而1941年11月由新民印书馆出版的《北京案内记》，就是安藤主编的，他本人撰写了其中的“民众娱乐”、“琉璃厂”、“古董店掌故”等篇章。参与撰写者基本上为不同领域的中国专家，如北京特别市公署观光科专员石桥丑雄、华北交通会社的石原严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东亚新报社的服部由治和早濑让、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福田三郎、故宫博物院编辑曹宗儒、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岩村成正、中岛荒登等。该书有别于一般的旅行指南之处在于：它的阅读对象有清晰的限定：是寓居北京的日本人。到1941年为止，北京的在留日本人达到十万，这批人不是观光者，他们“作为市民的生活”上的指导书籍匮乏。故而从内容上看，除了观光篇，“案内篇”、“生活篇”以及附录“各种便览”涉及到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描述得相当详细，且带有浓厚的学术史色彩。以安藤更生撰写的“琉璃厂”篇章为例，他在参考《康熙宛平县志》、《清代野记》、《清稗类钞》、《水曹清暇录》等大量古文献的基础之上，再经过现地调查才撰写完成的。他本人在北京七年间购买的两万多册书籍，遣返前夕因无法带走均留给了中国友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赠送给了当时在琉璃厂开书铺、后来成为文史学家的魏广洲。由这样一批中国通撰写的《北京案内记》形成了北京“立体的地志”。不过，仍然能从中窥见时局色彩：字里行间能够读出，北京并非是单纯的观光都市，而是“兴亚的最主要基地”。

周作人1939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上午阅《中学国文》四册，午了。……晚瞿兑之来，属为《中和月刊》撰文。”（11月10日）“以文稿一篇送给瞿兑之。”

13 安藤访琉璃厂经历，参考安藤更生：《北京怀古》，《中国美术杂稿》，二玄社，第159页。

(11月25日)“下午收编审会款，《中和月刊》二十元。”(11月26日)这些文字表明：由新民印书馆发行、创刊于1940年1月1日的《中和月刊》早在头一年已经筹备，周作人是编审会委员，编审会款是每期二十元，负责人是瞿兑之。

1940年。3月10日，周作人“为伪教育总署编审会审阅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25日，“为伪教育总署编审处审阅小学课本一册。”¹⁴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刊于《中和月刊》第3卷第1期(1942年1月1日)的《日本之再认识》一文是周氏宣布重开他的日本店的开张之作。本文篇末标注写作时间是1940年12月17日，故可将周氏重开日本店的时间也定在这个时期。而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周作人在完成了他的《日本管窥之四》¹⁵之后，郑重宣布关闭他的“日本店”的。

同样是在1940年，安藤担任今西春秋编、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发行的《乾隆北京全图》的监修。8月17日，王揖唐出任新民会会长，安藤担任副会长。8月安藤搬到北京市内四区南库角胡同二十号，紧邻白塔寺和阜成门，距离阜成门外北礼士路上的新民印书馆很近。安藤的这次搬家，似乎可以理解为他的工作重心从考察琉璃厂等文化场所转移到新民印书馆的业务本身。从1939年到1940年间，作为新民印书馆出版核心的中小学教科书，周作人也承担了编审任务。

1941年。10月19日周氏编定《药味集》，10月31日交给新民印书馆的张深切。这一年，为了庆祝恩师会津八一(1881-1956)还历，安藤请荣宝斋制作诗笺送给恩师。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安藤早晨从阜成门大街上听到了开战新闻。

1942年。在下中弥三郎的授意下，安藤组建新民印书馆的外围组织“中国文化振兴会”，1月12日成立，安藤担任理事长，奔波于立案与折冲事宜。该会成立的目的，是要对战时过着艰难生活的中国文化人进行援助，出版优质书籍，委员会推荐的作品获得与委员著作同等的出版条件；召开学术、文艺讲演会，定

14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5页、第599页。

15 周作人：《日本管窥之四》，《国闻周报》第14卷第25期，1937年6月。

期举办每月的委员会集会。会长曹汝霖，委员周作人、钱稻孙、徐祖正、傅芸子、俞平伯、苏民生、傅惜华、尤炳圻、姚鉴等。该振兴会计划编纂刊行《中国百科大事汇》，并且得到大使馆调查官志智嘉九郎的极力支持，后因战败而终止。安藤在战后编纂《下中弥三郎事典》时说：

战后二十年，一想到中国百科事典检索之不方便这件事，知道这个计划的那些人都深为惋惜。当初如果能够实现下中先生的方案的一部分，那么世界对于理解日本人文化性的批判，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吧。¹⁶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安藤希望向世界传达战时日本人在华的文化事业的意义，并渴望得到后者的理解。

1943年1月，安藤搬到北京市内四区东观音寺胡同，对于这次搬家，安藤特意在后面缀一句：“附近就是恩师周作人的宅邸”¹⁷。搬家之后，安藤为了创办《艺文杂志》一事频繁与张深切、周作人会面，确定周作人任总编辑，张深切任编辑长，结果《晨报》和中华通讯社记者两次泄露人事安排，并且把张深切写成总编辑，而把周作人写成编辑长。这让周作人非常恼火。他在3月21日给张深切写了一封信，说：

今日见晨报等关于艺文杂志之新闻，甚为残念。为此宣传实为自寻破灭，且已一而再，将来前途毫无希望。鄙人因不便明白拆台，但对于艺文杂志实已毫无兴味。以后拟不再过问，请别位负责去做，亦请不必再相见询问也。¹⁸

16 安藤更生年譜作成委員会編：《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29頁。

17 安藤更生年譜作成委員会編：《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29頁。

18 转引自王锡荣：《周作人一封未收集的信及其他》，李果主编：《海上艺文散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

周在给张深切写这封断交信之前，就已经给安藤写了一封同样气急败坏的泄怒信。安藤在3月22日给周作人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反复道歉、祈求“令堂大人”谅解，一方面把责任推到张深切身上，让他断然解职，一方面恳切挽留周作人继续接手《艺文杂志》事务。他表示因此事本人“自昨日没合眼，饭也吃不下去”，“神魂颠倒，展纸不知如何下笔”，同时晓以大义，说：“大则为了中国文化，小则关系到新民印书馆，也全然无颜面对中国和日本。那些努力要为新文学创造打下基础、好不容易才推出《艺文杂志》的编辑、干事、委员诸君的善意也将化为水沫”。¹⁹ 3月29日，周氏赴新民印书馆之招宴，商讨艺文社的成立和《艺文杂志》的出版事宜，确定杂志发行周期、性质及艺文社的编制等事宜等，日记记载“不甚成功，因张沈前意见不和，张又仍欲主裁，恐难成就也。”围绕《艺文杂志》一事所产生的纠纷，无外乎是杂志领导权的认定问题，而在一个多月前，周氏被从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如果对于后者他只能腹诽，在日记里发泄一通，那么他清楚地知道，在《艺文杂志》的领导权上，张深切是无法与他抗衡的。结果，张深切以离职为代价（之前张任《中国文艺》的主编，后因得罪日本占领军参谋少佐山家亨而离开，被安藤聘为新民印书馆的代理课长兼中国文化振兴会理事长）。6月成立艺文社，周作人任社长，钱稻孙、瞿兑之、安藤更生为顾问。其成立缘起称：“一国家一民族之生存发展，根本要图，乃在提高文化水准，普及学术思想。兹于世变日亟之际，我中国目前应兴革诸端，固如恒河沙数，不胜枚举，而近视远瞩，似仍以振兴文化事业，培植国民之健全知识，健全思想、健全精神，乃为当务之急。”表示要“纠合同道，群策群力，以一民间团体，参赞国事，复兴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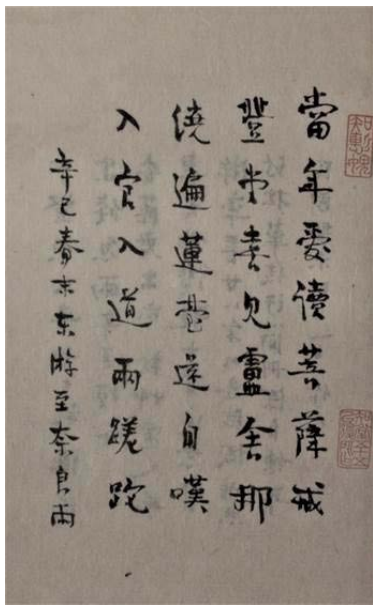
1944年，周作人以掌门人的姿态写了《艺文社与〈艺文杂志〉社》²⁰一文，主要说明如下几个问题：1，艺文社并非文学团体、文化团体、民间团体，没有

19 安藤更生1943年3月22日致周作人信，收入《安藤更生与周作人往复书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20 知堂：《艺文社与〈艺文杂志〉社》，《艺文杂志》第2卷第12期，1944年12月1日。

经官所批准立案，所做的事只是编辑《艺文杂志》，故艺文社即《艺文杂志》社；2，该杂志由新民印书馆发行；3，该杂志自1943年7月发行，自1945年1月起，“艺文社”更名“艺文杂志”社；4，在艺文社时期，周作人任会长，有编辑干事两名；艺文杂志社时期，周作人任顾问，另有编辑干事两名。再上溯到《艺文杂志》创刊号里的“发刊词”，其中称：“这个杂志，一无运动，二无主张，但也不一定便非沉默非暧昧不可。”²¹这种口气和做派也非常符合周作人。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之后的每期首篇重要文章，都由周氏撰写。出至1945年第3卷第4、5期合期停刊。

再回到1943年。4月1日，安藤拜访周作人，是请周氏为他所保存的会津八一书《东大寺大佛赞歌》册题诗一首。周慨然允从，认真赋诗一首：“当年爱读菩萨戒，登堂喜见卢舍那，绕过莲台还自叹，入官入道两蹉跎。辛未春末，东



21 “发刊词”，《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43年7月1日。

游至奈良。雨中登东大寺匆匆礼佛而出。倏忽两年矣。顷承安藤君出示秋草道人手书大佛赞歌十首，追念昔游卒书廿八字。以志感慨，唯恶诗拙笔，徒污简册自愧耳。民国癸未四月一日 作人。”1943年3月，战事日趋紧张，美术史家会津八一到奈良拜谒东大寺，挥毫写下十首大佛赞歌。会津又写了相同的一份，制成小册子，赠送给寓居北京的安藤。安藤后来回忆说：“当时用纸已经相当匮乏，这是用半张日本习字纸写就、装订成的小册子，墨气雄浑，纸端充溢着思古忧今的浓烈感情。我拿着这个册子去请周作人题跋，如今成为寒斋之宝。”²²周作人所作题跋，融入了自身的诸多体验，直接勾连起的，是1941年春周氏访问奈良的美好回忆，而这种与佛寺的记忆又跟周氏当下处境和他的佛教修行有关联：周氏于1941年2月8日刚被解除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无论当初上任是被迫还是自愿，突然被解职还是让周氏相当不痛快²³。但他同时又自诩从1939年以后为出家修行人，“爱读菩萨戒”，“喜见卢舍那”，既喜欢大乘佛教，又亲近密教，本应放弃世间俗念，被解职却让他感慨“入官入道两蹉跎”。这篇题跋完全脱去了应酬的色彩，兼具艺术水准和研究周氏思想历程的史料价值。此外，周氏收藏的印章众多，该题跋上所盖的两枚章“知惭愧”、“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也应该是经过周氏的一番思量的。这两枚章分别为寿石工、金禹民刻于1933年9月3日、1940年3月14日。“知惭愧”乃佛教用语，《法句经》卷上云：“世倘有人，能知惭愧，是名诱进，如策良马。”《杂阿含经》也多处出现“惭愧”字眼，称“常习惭愧心，此人实希有”，“有二净法能护世间。何等为二？所谓惭、愧”。它还见于《大般涅槃经》、《佛道教经》等经卷。周作人于1932年11月5日致信沈启无，说“晚上躺着阅莲池所编《沙弥律要略》乃弥有兴趣，不佞于此不能不佩服释氏府上，儒家之小学家礼等等皆不及也”，而在信尾称“‘知惭愧’一印想托张公一刻”。²⁴周氏刻章的冲动，显然是源自《沙弥律要略》，而该书上册中有这样

22 早稻田大学会津八一纪念馆馆藏之“东大寺大佛赞歌”，详见本刊德泉さち论文第265页。

23 这从周氏此后几天的日记里可以读出来。2月10日记：“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舒鲁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合前说而三。小人反复，常用手段故如是也。”17日载：“下午甚不快，阅毛诗疏消遣。”均出自《周作人年谱》第653页。

一句话：“知违佛制，生大惭愧”，故而想找张公即张樾丞。但不知为什么，后来转请寿石工刻了。寿山石朱文篆书“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一印是1940年周氏托金禹民所刻。他在《苦茶庵打油诗》²⁵一文中说，“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从那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算起，到现在才有六年”，也就是说，他自1939年五十五岁受戒出家，在写作此文的1944年已是出家人，可以印证周氏为安藤题跋时应该已在修行中。然而从文末所附作于1937年11月至1942年10月的打油诗来看，他似乎从来都无法笃行佛门的日常。打油诗“其三”说：

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

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1938年12月16日）

作为僧门日课的“粥饭”、“钟鱼”并非本色，而去做同样为僧人日常的“劈柴挑担”只是抱着随缘的心情。

打油诗“其六”云：

不是渊明乞食时，但称陀佛省言辞。

携归白酒私牛肉，醉倒村边土地祠。

作者后又附说明：“古有游仙诗，多言道教，此殆是游方僧诗乎，比丘本是乞士，亦或有神通也。”在周作人看来，方内、方外并没有壁垒，比丘亦可神通，“但称陀佛省言辞”之类的话也显示出他顺应现实的圆融的处世态度，而在判断权力能够到手的情况下又绝不手软，“嗜极辛辣”，这种所谓游于方内方外的“游僧”，注定“入官入道两蹉跎”。

24 《周作人书信》，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第267页。

25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杂志》第14卷第1号，1944年10月。

进入1944年。2月，安藤作为在华日本文化协会代表，被委任为“华北宣传联盟”理事，对华北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介入愈深。3月15日，周作人发布对沈启无的破门声明。4月13日，周氏写《文坛之分化》一文，其中云：

在去年春间，来了所谓文化使节的某甲，不幸的很，在北方的往日本留过学或是知道日本文学情形的中国人，对某甲都不大看得起，因此即使没有明白表示轻视，也总不能予以欢迎，只有某乙竭诚的招待他，这样一来，恩仇的形势已经很明了的立定了。某乙以某甲为后援，计划编辑纯文学的文学集刊。同时张深切也计划编一种文学杂志，由某部印书馆出版。……但是某乙与张深切意见决裂，表示不干。于是文学集刊中止，艺文杂志则改为尤傅陈三人主编，鄙人挂名艺文社社长如故。

……

上边说的某甲就是林房雄，最初来时报上说是文化使节，后来被改称分化使节，很是确切。²⁶

这里他以某甲某乙来指代林房雄和沈启无，只说到张深切与沈启无的分歧，只字不提自己与张的矛盾，似乎流露出对张的歉意。《文学集刊》由新民印书馆发行，沈启无任主编，1943年9月出版第一辑，1944年4月出版第二辑后，因周沈关系破裂，沈启无在北京无立锥之地，离京，杂志即告中止。沈启无此前抱怨“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²⁷指向周作人的矛头，也有暗中批评新民印书馆之嫌。事实上，《文学集刊》看似与周作人没有关系，但其发行时与《艺文杂志》一样，也打着“周作人”的招牌。现在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史所档案馆“杨云萍文书”，保存着

26 周作人：《文坛之分化》，《中华日报》1944年4月13日。

27 童陀：《杂志新编》，《文笔》周报，第一期，1944年2月。

杨云萍²⁸当时从台湾订阅《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的信息。新民印书馆寄给杨云萍有关于杂志内容、定价等信息的日文信件、《艺文杂志》预约规程和“新民印书馆出版图书目录”，杂志的预约规程是用中文写的，内容基本是日文信件的翻译，其中云：

根据大东亚战争的发展，以及客观情势的变化，中国的作家们，竟因此一变而为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的一翼，一致为树立大东亚文学而努力，并且这是很有具体实现可能性的。现在有力的作家们，以新的决意及作家的感情，都在待机将要为在新中国有着新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而奋斗。

因此，这机运就非常的突飞猛进。但在新中国一般文化界的期待里，应运而生的，端为艺文社社长周作人先生领导的月刊《艺文杂志》及季刊《文学集刊》的创刊了。

而这刊物当然是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想来定能以作家良心和崇高的文学精神，将向纯正有力的大东亚文学目标走去吧！

……唯有《艺文杂志》，《文学集刊》才是包容大众强而有力的文艺杂志。²⁹

周作人作为北京沦陷区的头块文化招牌，安藤更生也不敢得罪，周氏身前后都执弟子礼。该年周作人满六十岁。安藤在回忆中多次记述“在恩师周作人六十岁诞辰之际，我作为唯一的日本人忝列他的弟子”。即便是对周作人有意见，安藤也只敢腹诽。比如，周作人在沦陷时期出版的书，有近一半是在新民印书馆出的³⁰，而在版税问题上，周氏丝毫不让步，安藤为此事曾在松枝茂夫面前抱怨过，这是松枝在他的回忆中提到的：

28 杨云萍（1906-2000），台湾新北市士林区人。台湾新文学作家，曾任《台湾文化》主编，台大历史系教授。1920年与张我军相识。杨云萍的三篇小说《光临》、《弟兄》、《黄昏的蔗园》收入李献璋编的《台湾小说选》，杨云萍作序。排版后，被日方查禁销毁。

29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档案馆“杨云萍文书”之“北京新民印书馆所寄之信函（1943）”。

他（指松枝茂夫，引用者注）后来回忆：周作人在版税问题上，同鲁迅差不多，也是一点不含糊的。1942年，他的《药味集》由中日合资的新民印书馆出版。新民印书馆的老板安藤更生就说，周作人要拿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可是一般的日本人当时才拿百分之十，大家也都肯体谅出版社。我手里的这本《周作人文艺随笔抄》，定价是七十钱，不知周作人能在其中分润多少？³¹

写到这里，有一篇文章不得不提。作者董鲁安（于力）从1941年以前曾任教于燕京大学，1942年离开北京奔赴解放区，在华北联大任教。他著的《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一书中收有《安藤少将与周督办》，这里的安藤少将，指的就是安藤更生，新民会的最高顾问、“法西斯蒂盗匪中的一个小喽啰”。作者说周作人坐上教育总署督办的位子之后，支持他的只有大使馆和东京方面文化界的一些人，没有枪杆撑腰，而“安藤正在势焰熏天，那把这个‘支那名流’放在眼里？”日军占领宜昌，按惯例，各级大中小学生都要手执日章旗，到天安门一同“祝祷”，而教育督办周作人认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结果到会场的寥寥，让正在会场的安藤大怒，要带卫兵去抓周作人。后来在大使馆的一等参赞土田的再三劝解下才把安藤拦住。³²这一节论述的不可靠首先在于史实错误：宜昌失守是在1940年6月17日，其时周氏尚未就任教育总署督办，将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本身就很荒诞。其二，安藤不曾担任新民会的顾问。《日伪新民会》一书在述及东郊兴亚公园兴修状况时说起其中纪念塔前面的二株马尾松树时这样

30 在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书如下：《药味集》（1942），《药堂杂文》（1944）、《书房一角》（1944）、《秉烛后谈》（1944）。其余则是：《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1940年2月、《药堂语录》天津庸报出版社1940年、《自己的文章》三通书局1941年1月、《周作人代表作》三通书局1941年2月、《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11月、《李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

31 戴燕：《日译者眼中的“知日派”》，《上海书评》2012年9月2日。

32 详细情形可参考于力著：《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14-17页。

说：“左为王揖唐委员长亲植，右为安藤副会长亲植”³³，可以推断在王揖唐于1940年上任新民会会长的时候，有可能是这个时候安藤担任了副会长。不过到了1942年新民会会长就更换了。再者，从安藤对周作人的态度来看，安藤未曾敢有捉拿周作人的胆量。安藤的身份是军职人员，是因为他早就知道那是个军部统治一切的时代，不跟军部打交道，任何事情都无法办成。但他本人在北京沦陷区从事的是文化活动。

1943年12月，安藤与石原严彻（秋朗）、吉田璋也、柳悦孝、平塚运一等人同往天津参观杨柳青版画。1944年1月，安藤在杂志《东亚新报》1月号上发表《杨柳青踏查记》。同年11月，安藤更生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是名单中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可以推测，他的身份并非作家，而是会议背后的军部人员。在参加完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前往扬州。对扬州的多次考察，为后来的鉴真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安藤和周作人，我想最恰切者莫过于“砚北之交”。后面将提到，安藤以“砚北”来尊称周作人。所谓“砚北”，是因几案面南，人坐砚北，指从事著作。安藤本人亦可称为“砚北者”。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际，他描述：“战败的悲报频频传来，难以规划明天是什么样子，我只是不离开书桌，继续写作。我做好了精神准备：我要不停地写下去，直到死亡。就在一队携机关枪乱打门扉的时候，我也在书斋里平静地迎接。由于一个巡警因为一个偶然的機會做过我的部下，幸运地让我免于狼藉。我一如既往地写作，在遣返之际，原稿与所有的研究资料一起不得不都弃留了下来。”³⁴

1945年10月因战败安藤从新民印书馆退职。安藤后来描述：“深秋接到了到北京西郊的满铁社宅集结的命令。社宅在挖战壕，我们睡在帐篷。就这样迎来冬天，过了冬天。通货膨胀得厉害。大家在茫然中等待着遣返。”³⁵据说这时候

33 《日伪北京新民会》，第361页。

34 《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序，载《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31頁。

35 安藤更生年譜作成委員会編：《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31頁。

周作人委托赵荫棠到张家口找到于力（即前述《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的作者），请于力询问共产党是否可以接纳他，结果遭到成仿吾的一口回绝。³⁶同年12月6日因汉奸罪被国民党逮捕。

1946年2月，滞留华北的日本人集结天津；3月29日安藤等日本人到太沽港乘坐美国船，4月3日登陆仙崎港。二人恢复联系是在1951年11月17日。现存的二人往复书信，安藤氏三十通，周作人四十七通，已由周作人之孙周吉宣整理、陈力卫和王中忱翻译，题为《安藤更生与周作人往复书信》，刊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1963年10月，安藤访问周作人，后作《苦雨斋采访记》³⁷。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离世。安藤因肺癌和尿毒症于1970年10月26日去世。去世前十一天（10月15日），他去国立癌症中心检查完，在回家的路上迫切地想要一只中国的拐棍，“于是驱车赴横滨中华街。我已经无法步行，只能横卧在坐席上。归途，买到了期待中的拐棍，就有了旅路永远的相伴者。”³⁸

小结：对待殖民遗产的态度及战时周作人附逆的被迫性问题探讨

笔者以编年史的形式呈现了战时战后安藤更生与周作人的关系。关于战时情况，这里有几点需要补充说明：

其一，那是个日本军部掌控权力的时代，文化事业必须依赖军部方能拓展。故下中弥三郎为了在华北成立出版印刷机构，反复与军部折冲斡旋，甚至“新民印书馆”这个名称都有迎合“新民会”之嫌。安藤更生为了保护战火下的山西大同古迹，也以军人身份从军。

其二，成立后的新民印书馆与新民会关系密切。比如，1939年8月24日，新民会首都指导部学校消费合作社扩大组织，更名为“赈学合作社”，一方面进

36 于造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3期。

37 安藤更生：《苦雨斋采访记》，林敏洁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38 安藤更生年譜作成委員会編：《安藤更生：年譜 著作目録》、東京：安藤きよ、1972年、第91頁。

行合理管控，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之学习用品，一方面与教育当局紧密合作，以图得到各种援助。创立委员除了时任北京市长、新民会首都指导部长余晋猷等，还有新民印书馆董事长池宗墨、新民印书馆常务董事安水秀雄。担任委员会书记的是新民印书馆学用品部次长龟井五一郎。³⁹从组织机构的人员配备上看，新民印书馆深度介入官厅活动。

其三，新民印书馆的本质和初衷是服务于军部的，但表现出巨大的包容力。1942年成立的中国文化振兴会，跟日本考虑到缓和占领区的统制政策有可能遭受到的非难有关，所以设定的任务是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的确笼络了北京的知识精英，推出了一系列远离政治的文化著作。如果拿它与武德报社相比，特点更为明显。按照木山英雄的说法，中国文化振兴会和武德报社服务于战争这一使命虽是一样，一方受到拥有巨大包容力且带壮士风格的书店老板之庇护，另一方则直接与军方的功利性谋略任务相关。然而，在聚集而来的中国人一方看来，与振兴会的选择精英之保护型和作家协会的一网打尽型相呼应，结果是自然有不同⁴⁰。故而安藤与周作人，不是殖民者的“少将”与伪政府的“督办”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发号施令者与听命者的相处模式，而是“砚北之交”和类似师生的相处模式，这就使得周作人在安藤面前能够心安理得地索要高版税和发脾气。

其四，新民印书馆在北京发行了近十种杂志：《中和》月刊、《东亚前线》、《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燕京文学》、《华北日本语》、《文学集刊》、《东亚联盟月刊》、《全家福》、《艺文杂志》，其中在文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中和》月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文学集刊》和《艺文杂志》都与周作人关系密切。这里要重点补充一下《中和》月刊。

《中和》月刊创刊于1940年1月1日，终刊于1945年4月，共刊行6卷六

39 《日伪北京新民会》，第74-75页。

40 木山英雄：《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77页。

十期，设有图画、别录、时事荟记、书林偶拾、专载等栏目，杂志社社址在北京府右街运料门内翠华轩。该刊的“发刊词”有如下表述：“当出版界异常寂寞之近日，我们创刊这一个小小的杂志，以与读者相见”，以鉴往知来的历史态度，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所持的态度有两种：“一是自讼，一是自救。”所谓自讼，即以宋儒克己的精神来省察自己民族。“讲到自讼与自救，便没有丝毫可以自是自满自逸的。本刊所取的态度，也就是这种态度。本刊并不敢随便有什么主张，只是平心静气，将各种可研究的资料，作学术上实事求是的研究，以供观览采择而已”，“我们感觉到鉴往知来的重要，所以打算尽量注重于史料的介绍。我们又感觉到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研究的材料，范围愈广，愈有近乎真理的希望，所以打算各方面的材料，都尽量容纳。”

《中和》月刊虽然不免带有时局的色彩，但是其基本态度是历史的、学术的，视角是互相关联的。该刊创刊于1940年，恰逢鸦片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发刊词希望以此为契机，寻求以独自的力量实现民族的更生自新；同时以纪念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活动为起点，加强对日本的认知。笔者看到有后世研究者在论述《中和》月刊迎合时局的特性时，特意强调“纪念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活动”，然而阅读发刊词，仔细梳理其文脉，可以辨明，编者是试图通过这个活动加强对日本的认知。认识日本，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一项重要课题。战争烟云已经消散七十多年，如今有余裕来重新面对这项课题。那么再反观《中和》月刊，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日本，它都有大量的重要的知识生产。恰恰因为这一点，该刊物成为了解沦陷北京的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的一手资料。1974年，该杂志以《中和月刊史料选集》为题名，被重新编纂为“艺术民族”、“史学”、“近代史”、“书目”、“史料”等五种论文集，由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全卷的影印版作为“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之一。曾经被视为殖民者的思想阵地，如今转化为地志、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里当然有殖民地研究上的学术视角的丰富，更在于本身丰富的知识生产。再从这些资料反观办理杂志、经营新民印书馆的这一批日本知识人，他们赌

上性命，或者在没有预想到日本战败而打算把余生托付给中国，在没有突破殖民框架的前提下，他们对日本的文明话语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实践。厘清这些，是达成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有关新民印书馆在战中战后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影响，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而安藤与周作人的交往模式，在于逸出了我们所理解的殖民者 / 被殖民者、加害者 / 受害者的框架限定，并不是某些资料所描述的“安藤少将与周督办”的交往模式，将安藤丑化的固定思维，无益于我们理解日本的文化殖民的丰富性，殖民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可供批判的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周作人的落水，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的？现有的史料同样揭示，周作人在一番犹豫之后选择与日本合作，这让不少日本知识人吃惊。

陈言，本名陈玲玲，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是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民国文人的艺术实践，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译著有《冲绳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京都流年：日本的美意识与历史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精神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llcheny@aliyun.com llcheny@163.com